

地铁织就彭城新画卷

杨亚伟

清晨的徐州，薄雾轻抚着城市轮廓。我站在地铁1号线的站台上，望着玻璃幕墙外渐次苏醒的街市，心中涌动着别样的感慨。作为一名徐州人，如今退休了，我终于有时间细细品味这座城市的脉动——6条地铁线路如纵横交错的血管，将彭城大地紧密相连。其中1、2、3、6号线已投入运营，它们不仅勾勒出便捷的交通网络，更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“好”字，仿佛在向这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致以最真诚的礼赞。

列车驶入隧道时，电子屏上的徐州地铁建设历程影像如时光卷轴般展开。从2019年1号线首段开通，到如今四条线路织就的“好”字形网络，这背后是无数建设者“逢山开路”的勇气。我扶住一位拄拐的老人，他笑着摆摆手：“同志，我天天坐地铁，比你们熟悉得多。”老人的话让我想起《论语》中的“老者安之”。地铁的便利，让“老有所养”从理想变为现实。在徐州，7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坐地铁，60至69岁老人可享受半价优惠，这一善举，恰是“民本”思想的现代诠释。

换乘地铁2号线，我特意选了靠通道的位置。这条线路如一条蜿蜒的巨龙，将徐州的商业中心、文化地

标与居民区紧密串联。车厢内电子屏上的线路图随着列车行进不断刷新，像一幅动态的现代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一位背着画板的姑娘递来手机：“叔叔，麻烦您帮我拍张照！”她告诉我，她是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，正在创作“地铁与城市”系列作品。“您看！”她指着电子屏上的城市影像，“地铁就像城市的血管，让每个角落都充满活力。”脉络通畅，方能生生不息。一座城市的健康，正体现在这钢铁脉络的畅通无阻。

3号线的列车驶入站台时，我注意到车厢内的电子屏正在播放“徐州地铁4号线迎来新年施工‘开门红’”的报道，配图是工人们在地下数十米处欢呼的场景。这让我想起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那个在治水工地上奔走的身影——“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，乃劳身焦思。”从上古治水到现代地铁建设，中华民族对“疏通”的智慧，始终贯穿着对民生的关怀。“您好，需要帮助吗？”一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来。我指着列车说：“这条线路是不是经过楚王陵？”她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们在设计时特意避开了文物保护单位。”此刻，我好似看见《诗经·大雅》中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的古老

箴言，正化作地铁钢轨与楚汉文化地层的无声对话——现代工程与历史文脉的共生。

6号线的列车驶入站台时，我注意到车厢内的电子屏上显示着实时温度数据，与车外的地下环境形成微妙对比。“爸爸，地铁真的会‘呼吸’吗？”一个小朋友指着车窗上的雾气问。他的爸爸笑着解释：“这是地铁的智能温控系统。”人类对发展的追求，始终伴随着对技术的敬畏。在玉泉河站，我遇见了正在调试设备的工程师小陈。他告诉我，6号线采用了最新的“磁感数字轨道”技术。“就像古人用‘司南’指引方向。”他指着控制台说，“我们用数字技术让地铁更聪明。”

当最后一班地铁驶入地下，我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，忽然想起《论语·子罕》中的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这飞驰的地铁，不正是时间的具象化吗？它让“朝发夕至”从文学想象变为生活常态，让“天涯若比邻”从诗意表达变为现实图景。

走出地铁站，夜已深。但城市的脉搏仍在跳动——外卖小哥的电动车、夜班公交的车灯、24小时便利店的霓虹，与地铁的轰鸣声交织成一首现代交响曲。《诗经·小雅》有

载：“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”一座城市的活力，正体现在这昼夜不息的流动中。

回家路上，我特意绕道去了彭祖园。月光如水，将古朴的亭台与现代的地铁站晕染成一幅古今交融的画卷。那一刻，时光的丝线在亭角飞檐与地铁钢轨间悄然穿梭——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，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，它让“彭祖养生”的传说有了现代注脚，让“楚汉文化”的底蕴有了新的表达。作为一名农业农村部门的退休干部，我见证了徐州从“田园牧歌”到“都市脉动”的变迁，更深刻体会到这飞驰的钢铁巨龙，承载的不仅是市民的出行，更是一座城市对文明传承的执着，一个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站在马年新春的门槛上，我仿佛看见：4号线与5号线的盾构机正于地下深处掘进，恰似两条沉睡的巨龙蓄势待发；1、2、3、6号线的列车正在城市中穿梭，宛如四条跃动的脉搏。从“彭祖故国”到“地铁之城”，徐州始终在变革中坚守，在创新中传承。

新春将至，愿这“好”字形的地铁网络，继续织就彭城的锦绣画卷；愿这飞驰的钢铁巨龙，载着徐州人民的美好梦想，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！

最难忘的过年记忆

华玉琳

快过年了，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过年时年终决算的场景，那场景是我难以忘却的。

腊月廿二，雪落得无声。生产队队部的土墙外，挂了盏煤油灯，风吹得火苗在发抖。队长站在条凳上，手里捏着一张纸，纸边卷了毛，字迹被汗渍得模糊，他念名字、念工分、念粮数。

念到“华老三家”时，队长声音顿了一下，像被冻住的井绳。“五口人，全家口粮1500斤，已预支800斤，工分折粮200斤，尚欠500斤（口粮应有工分抵扣）……”他说的是“预支”而没说“透支”，可全村人都听见了。那不是数字，是悬在屋梁上的秤砣，压得人不敢抬头。我们家，是队里最大的透支户。

父亲在外乡的银行工作，户口不在家，根本上也没他名字。而我们兄弟几个都未成年，不能作为劳力参加劳动。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力，母亲瘦得像一根被风刮了多年的芦苇，腰弯着、手抖着，却从没请过一天假。她每天挣8个工分，只相当于男劳力的一大半，可8个工分却换不来全家一天的粮食。我们四个兄弟，像四只刚离窝的麻雀，眼巴巴望着粮仓，却从不敢靠近。

那年冬天，我12岁。我蹲在灶台边，看母亲把最后一把高粱面，做成

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。她说：“吃吧，吃饱了，明天去拾粪，能多挣两个工分。”我静静地看着锅里的粥，好半天才拿起了碗。

年终决算那天，是全村最安静的一天。没人笑，没人说话，连狗都躲进了柴垛。有人领了粮，扛着麻袋，脚步轻快，像扛着春天。有人低着头，从队长手里接过一张纸，纸上有红印，是欠条。我看见邻居家的连宗，把一袋玉米扛在肩上，回头冲我笑。我没回他，只是盯着他肩上的麻袋，那鼓鼓的轮廓，像我梦里见过的山。我那时想，等我长大了，要挣一百个工分，要让母亲不用再在寒夜里算着明天的饭，要让家里的粮仓不是空的，满到能溢出来的那种。

我没想到，后来工分制慢慢取消了。包产到户的风，吹过江淮大地，也吹灭了队部土墙上那盏煤油灯。再后来，我读书学习，参加高考上了学，毕业后分配到乡镇工作，再后来调到了城里工作……

每到腊月，我仍会梦见那盏灯，梦见队长念名字的声音，梦见母亲在灶前佝偻的背影。如今，家里米面不缺，冰箱里鸡鱼常备，可我再没吃过比那年腊月母亲熬的高粱粥更暖的饭。那碗粥，是用透支的尊严熬的，是一个女人用一整年的沉默熬出来的。

过年穿新衣

陈玮佳

年关快到了，我想起父亲说的“岁暮天寒，最让人开心的是‘儿女新衣，笑语盈门’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年的样子和一件新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我小时候，家里的衣裳平时都是老大穿完老二接着穿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，裤脚也打了补丁，可还是穿在身上。只有过年时才有穿新衣服的机会。所以每到快过年，很早就盼着某一天外婆从集市上回来，手里攥着一卷新布。

那卷布颜色往往特别鲜亮。要么是大红色的卡其布，要么是带着细碎小花的的确良，被外婆小心翼翼地裹在包袱里。一进家门，就把它放在堂屋的旧木箱上。那鲜亮的颜色，一下子就把冬日里灰蒙蒙的屋子点亮了，就连窗棂上积着的薄霜，好像都多了几分暖意。

外婆拿出针线筐开始忙活起来，竹针穿来穿去，棉线飞来飞去。我们几个孩子就围在旁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片慢慢成型的衣料。缝出来的衣裳，领口会缀上一圈细细的滚边，裤腿收得刚刚好，穿在身上，不肥也不瘦，特别妥帖。

新衣做好那天，外婆笑着催我们试试，可我们都生怕把崭新的衣服弄脏了。就轻轻套上，在镜子前转个圈就赶紧脱下来，折得方方正正，压

在枕头下。白天要上学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手摸着枕头下平滑的衣服，做梦都能笑着。

除夕当天一大早，院子里就响起了鞭炮声，这家放完那家放。我们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翻出枕头下的新衣。穿衣裳的时候，动作可轻了，扣子一颗一颗仔细扣好，领口理了又理，裤脚抻了又抻。

年初一清晨，我们穿好新衣跟着父母去串门。手里的篮子里，有外婆蒸好的年糕，还有炸得金黄的丸子。邻里们见了，总会笑着夸一句“这孩子，穿得真精神”。我们就挺起胸脯，得意得像充满气的气球。要是遇上穿新衣的小伙伴，就得站着比一比，谁的布更艳，谁家的滚边更精致，叽叽喳喳的，比鞭炮声还热闹。

每到过年，父母也都添了新衣服，外婆身上也多了一件藏青色的夹袄。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炖肉，还有煮好的饺子，父亲倒上两杯酒，外婆夹起一块肉放到我们碗里。灯火昏黄，照着满屋子的新衣，也映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如今日子好了，随时都能买新衣，却找不到当年那种把新衣压在枕头下的期盼。其实，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件新衣，而是外婆的针线活，是除夕院里的鞭炮声，是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。